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问题研究

——对李远教授的采访

阿德莱德大学 何晓波*

采访嘉宾:李远, 获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公共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东亚学院教授。

何晓波:李教授, 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首先, 请介绍下您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

李远:很荣幸接受《经济资料译丛》的采访。我目前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并试图应用这些理论去研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何晓波:我知道您曾经在多个国家求学和工作, 能不能先谈谈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在各国的异同?

李远:我在欧洲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也相对更加了解一些。我曾经在意大利读博士, 在美国做访问学者, 在德国做博士后, 在瑞典做助理教授, 现在又回到德国做教授。总得来说对于经济学学术评价这一块, 各国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评价标准都主要是看在国际认可的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发表。但是各国的大学管理体制则差别很大。欧洲的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 虽都为‘公立’, 这里面差别也很大。在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 公立大学有点像国内所说的‘事业单位’, 大学教师也通常是纳入国家公务人员的管理体制。而在瑞典, 公立大学有点像国内所说的‘国有企业’, 大学的管理也更加类似于企业, 大学需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润, 因为通常政府只提供给大学一部分经费, 另一部分则需要大学通过各种方法自筹。虽都是依赖于政府的公立大学, 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大学的独立研究, 并鼓励学者们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辩论之中。所以在欧洲各大学, 社会责任都是作为一项对于教师的重要的考核指标。

何晓波:您所研究的领域在经济学里算不算“冷门”? 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呢?

* 何晓波获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阿德莱德大学全球粮食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电子邮箱: xiaobo.he@adelaide.edu.au。

李 远:政治经济学应该算是近二十多年以来经济学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近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和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不断交叉的趋势。很多问题以前都不在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之内,但现在这些研究领域都被经济学家广泛涉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数理工具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通过与这些学科不断交叉,经济学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当然,这个学科在国内可能还不是很为人所知,当提到政治经济学时,人们往往会想到在中学和大学里学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当初很多国内的朋友都认为我学的是个‘冷门’专业。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但是他们的误解也有其历史渊源。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刚开始时,政治经济学就是对经济学的旧称,很多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等,都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19 世纪后,经济学与政治学出现了分离,政治经济学也因此从主流经济学中淡出。在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政治经济学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指。这也是为什么如今还有很多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现今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其实是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是利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去分析非经济市场环境下的决策问题。例如过去经济学假设市场中的竞争者是自私的,而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是无私的。但政治经济学则认为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中的竞争者一样,都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的。所以,我觉得为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把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简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当初我选择这个方向有其必然因素也有其偶然因素。在我刚读博士时,政治经济学在欧洲已经成为一个热门专业,可一直以来中国的留学生很少有人去学这个,大部分人都认为因为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中国完全不适用。而当时刚接触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它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中国的国情不同,政治体制也和西方不一样,但是这些理论更多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而当时可以用来系统的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的方法实在很少,于是我希望先从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开始,试图找到可以系统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的方法。另外,我自己的兴趣一直比较广泛,曾有过几次跨学科学习的经历,所以也一直以来对跨学科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何晓波:2013 年,您在 *Economics of Transition*(《转型经济》杂志)上讨论过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经济学 Li, Y. 2013. “Downward accountability in response to collective ac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2(1):69–103., 对这篇文章我记忆犹新。您关注了计生罚款、劳动纠纷、公共产品供给、省级官员晋升等一系

列问题。我想先请您介绍下这些主要变量,它们的数据来源如何?数据收集肯定不容易吧?

李远:这是我自己写的第一篇实证研究文章。当时数据的收集确实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也因此尝试了很多方法。其中大部分的数据都是我通过查阅各种资料和统计年鉴一项项收集到的。但是有一些关键变量的数据(如官员晋升,计生罚款等)是统计资料中所没有的。不过幸运的是我当时得到了很多学者在数据方面的慷慨帮助,其中包括李宏彬教授、Avraham Ebenstein 教授和 Ekaterina Zhuravskaya 教授。我和这些学者有些从未谋面,有些仅在会议上有过短暂接触,但他们得知我的研究需要某项数据时,都愿意把自己的数据无私分享。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研究也许就会因缺乏某项数据而无法进行下去。

何晓波:除了数据之外,计量模型也有困难吧?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是“内生性”。在这篇文章中,您是如何处理的呢?

李远:如何解决“内生性”问题是当时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挑战。我首先是根据不同主体的偏好冲突,区分出对于不同公共政策的计量模型。但是每一个不同的计量模型中又存在着不同的‘内生性’问题。我在文章中运用了诸多方法(如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等),试图从最大程度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匿名评审的过程中,两位同行匿名审稿人和期刊主编都给了我很多关于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意见。也是因为他们的这些意见让这篇文章能在这方面更加完善。

何晓波:我知道您其实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下您所在领域内的理论研究最新动向和您最近的一些思考?

李远: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如选举理论,党派竞争理论,问责制理论等)都是基于西方的经验,西方的政体,并着眼于解释西方的问题。近年来,这个领域内的最新动向就是开始关注西方政体以外的其他类型政体的研究。其中,现在最热门的当属于对中国政体和中国问题的研究。过去,中国一直被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作特例,中国研究也一直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相互分离。现在,中国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正不断融合。未来,将出现更多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和模型。除此以外,另一个新的动向是对于文化的研究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热点。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找能决定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开始时经济学家们找到了制度,特别是伴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制度被很多人认为是能决定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可是制度也是内生的,也是在不断的变化。比制度更加稳定的,更加外生的是文化。于是现在很多政治经济学家们开始研究文化对于制度的影响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一个更加跨学科的问题。

何晓波:有了研究结果就得面临下一步难题——学术期刊发表。英文期刊投稿周期是否很长?你们专业领域都有哪些主要的杂志?它们的录稿标准是什么呢?

李 远:英文期刊投稿、审稿、一直到发表的周期确实很长。我的专业领域主要期刊有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 Choice 等等。它们的录稿标准和其他主流经济学期刊都差不多,一般都是看文章的创新性,严谨性等等。如果说起它们的偏好,那么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更看好理论加实证的文章,它不仅收录政治经济学文章,也发表很多公共经济学的文章。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更偏好对于理论文章和关于转型国家的讨论。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算是这个领域期刊的后起之秀,是伴随着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而 Public Choice 则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性期刊。

何晓波: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您有什么建议吗?

李 远:我觉得首先应该重视对政治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如何深化改革和如何解决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冲突都有重大的参考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生产率高速提升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社会矛盾、权力腐败、环境恶化等等;网络和各种即时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给社会稳定和政府执政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的政治学理论都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些问题,而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对全面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都多次提到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需要大量的智力支持,所以应该首先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另外,可以尝试让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教学联系更加紧密。在政治学研究生教育中加入一些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数理工具的学习,在经济学研究生教育中加强对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政治学问题的能力培养。鉴于国内政治学系往往更偏重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的现状,我更加倾向于以经济学院为主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的培养。有条件的院校可以先进行一些试点。

第三,我觉得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总得来说,相比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国内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较慢,还属于起步的阶段。科学研究不分国界,应该取长补短,充分吸收借鉴国际同行的教学研究经验。

何晓波: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应该叫作“提议”。您离开家乡很多年了,借采访的机会能否跟国内亲人和学界同仁说说你现在的感受?

李 远:有一个地方,不论你走的多远,不论你离开多久,最后你会发现你的心其实从没真

正离开过,这个地方就是故乡。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变越好。衷心期望国内的亲人朋友们身体健康,幸福美满。

后记:2014年笔者应李远教授的邀请赴瑞典访问,由于行程匆忙,未能笔录做一次正式的访谈。因此,笔者非常感谢《经济资料译丛》给予了这次书面形式采访并完成心愿的机会。李教授在采访中介绍了求学和工作的经历,谈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与中国改革相关的研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这方面理论与实证的研究不仅能丰富学界的讨论,更能全面推进中国现实的改革。